

## 国际化与全球张力：以史为鉴

Philip G. Altbach, 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终身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继任主任、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在过去一年中,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多地的政治与军事局势日趋紧张,如巴黎就遭受了宗教基要主义分子的多次袭击。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这些事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思考。当今的全球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际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初衷是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推动国际合作,而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宗教与观念冲突正挑战着这一初衷。自冷战结束后,我们并未在全球范围内感受过这种紧张与动荡。那么,在关于如何应对新环境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 止战之战

中世纪的欧洲式高等教育与现在有一些相似之处:学者与学生具有流动性,并使用一门通用语言——拉丁语。到了18、19世纪,大学很大程度上变得不那么国际化了,它们各自采用本国语言,有时甚至禁止学者出国学习,优先考虑本国权益。因此,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国家化、去欧洲化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催动了国际主义的爆发。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因为正是这一进程塑造了当

前的现实情况。从一战的创伤中醒来,人们对学术界有着强烈的信念,相信其能够帮助建立国际团结,有助于共建和平。距离一战爆发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有必要清楚认识学术界在这些理想主义的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最终的失败。

欧洲带着深深的创伤从一战中苏醒。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与学者都想在欧洲范围内团结起来以助和平。战争冲突开始时,整个学术界被轻易地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背弃了启蒙运动的理念,这着实令人震惊。

1919年,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国成立;1925年,德意志国际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通常简称DAAD)在德国成立;1934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在英国成立——这些机构的成立,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庇护下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政治举措的实例。然而,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未能阻止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或是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平与合作的目标再次被反面政治势力所摧毁。在德国,这些举措的失败最具戏剧性,德国的高校直接参与了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

## 一场真正的全球战火及其后果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想象不到还有一场类似的战火——仅21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二战在1945年结束，又一波理想主义浪潮开始了。这一次，伴随而来的还有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对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承诺。殖民帝国的解体也使得新兴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新的局面。高等教育的合作再一次被认为是促成相互理解的方式，同时适度的交流项目得以推进，其中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the Fulbright Program）最为引人注目。在欧洲，国际高等教育活动主要着眼于学生与教职员工由前殖民帝国向西欧的流动，但是这些活动相当分散且有限。在国家层面，至少在欧洲和北美，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家双边协议及合作发展项目中所占比例较小。在这些项目计划里，学术机构一般都是被动的合作者。

## 冷战与国际化的政治化

高等教育与文化精神生活一样，都成了那段时期意识形态争斗的走卒和前锋。“感觉不错”的时代只持续了几年，早在1946年苏联与西方的争斗就已经开始，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是冷战的重要部分，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以及强国间的政治斗争则是其核心内容。

受冷战影响，决定国际教育进程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理想主义，这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尤为突出。而欧洲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第三世界才是国际教育合作与斗争的主战场：那里有仍占支配地位的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和体系，有英语语言的影响，有国外培训的冲击，有西方科学产品、思想和结构的

主导。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国际高等教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新殖民主义及西方高等教育霸权有关。就其本身而言，苏联也进行过类似的过程来扩大其影响力。在欧洲，“铁幕”（Iron Curtain）将中东欧与西欧隔开，也阻止了除最基本的高等教育合作以外的其他所有合作。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充分恢复过来并且开始其整合进程时，一种新型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才开始浮现，它专注于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学术合作交流。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某种程度上为学术合作打开了大门。

就像与苏联的关系一样，当时西方的对外学术政策也是与冷战中的权益直接相关。前殖民势力，即英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荷兰，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奖学金项目、校际合作以及其他一些计划来维持其在前殖民地的影响。这些措施同样直接叫板苏联。

作为冷战中与苏联旗鼓相当对手，美国建立了积极而深远的高等教育“软实力”措施，比如：1946年，创立了“富布莱特计划”；1958年，确立《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该法案是对前一年苏联发射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 I*）的直接回应；1960年，颁布《高等教育法》第六款（*Title VI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0*），旨在促进区域研究、外语中心、国际研究和国际事务项目的发展。许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和其他一些组织资助的学术合作伙伴项目，在美国大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间建立了联系。这些举措必须要置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中来看，因为美国当时正努力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者。

## 冷战之后：日益提升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20世纪80年代，中东欧与西欧、美国之间的学术合作越来越多。然而，学术合作仍然主要是政治问题，因而缺乏机构与个人的自主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铁幕倒塌，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才得以快速增长。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和各国政府都开展了多种项目，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交流合作。欧共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于1990年创立了“跨欧洲高等教育合作计划”（the Transnational 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 for University Studies scheme），最初参与国只有匈牙利和波兰，多年后扩展到其他的中东欧国家。另一个国家层面的举措是奥地利政府的“西帕斯项目”（CEEPUS）。这些措施不仅为这些国家加入欧盟（the European Union）的常规项目——如研发框架计划（the Framework Program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和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奠定了基础，还被视作是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试验地。毫无疑问，无论对欧盟“核心”成员还是更广泛的欧洲观众而言，大批由欧盟资助的交流、研究与合作项目，都是与欧盟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挂钩的。

## 政治与国际高等教育的组合

鉴于对欧洲一体化批判的增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增长，以及俄罗斯、西欧和美国三者间的紧张局势，我们会再次目睹欧洲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和去欧洲化吗？

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主导。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冷战时期，学术合作与交流是国家间的主要联系：这些活动持续开展，同时受到外界的推动，以期为进一步的联系奠定基础。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国际高等教育与其在早期历史阶段时的状况已全然不同，和冷战时期也不一样。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政治与学术影响力的日益加深，国际高等教育的范围也不一样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现实一些，因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并不是和平与相互理解的保证，而是保持开放沟通和积极对话的必要机制。那么，日趋扩大的全球冲突，包括宗教原旨主义、复苏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挑战，会不会损害国际高等教育合作中已取得的卓越成就呢？

注：本文为缩减版文章，原文发表在《国际教育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年第19卷第1期）上。